

SHANGHAISHI SHEHUI KEXUE BOSHİ WENKU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 “现象学”之谜

徐英瑾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七辑】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 “现象学”之谜

徐英瑾 著

【第七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现象学”之谜/徐英瑾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2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ISBN 7-309-04796-6

I. 维… II. 徐… III. 维特根斯坦, L. (1889 ~ 1951) -
现象学-研究 IV. 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4977 号

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现象学”之谜

徐英瑾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陈士强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2.5
字数 280 千
版次 2005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309-04796-6/B · 243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作为徐英瑾的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本不该赞扬自己的学生，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说，他的博士论文《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现象学”之谜》是一篇近年来不多见的优秀博士论文。在我看来，徐英瑾的博士论文主要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

特点之一：扎实的专业基础。应当看到，虽然徐英瑾的博士论文探讨的是维特根斯坦版本的“现象学”，而不是以胡塞尔为代表的欧陆现象学，但这个选题已经暗含着欧陆现象学传统与分析哲学传统中出现的“现象学”理论之间的比较。也就是说，对欧陆现象学的把握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本课题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背景。正如业内人士所了解的，欧陆现象学是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难题。现象学研究之难，不仅在于它所使用的术语的晦涩难懂，也不仅在于它所拥有的一大批现象学家提出了彼此迥然各异的现象学观念，而且还在于该学派的肇始人胡塞尔总是出于其严格的科学精神而不断地去修正、改变自己的看法，从而大大地增加了人们研究他和了解他的难度。诚如萨弗兰斯基在谈到胡塞尔时所说的：“在谈到他自己的时候，他总是说，他是一个‘初学者’。他也不断地研究他自己的著作。当他想把以前的手稿定稿，以供发表时，他总是把整个书稿又重写一遍。这使得助手们深感

绝望。他总是重新从头开始思考。他很难简单地承认他以前写的东西。”^①

如果说,理解和掌握以胡塞尔为代表的欧陆现象学的基本思想乃是这篇博士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第一个困难的话,那么,理解和掌握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发展和其前、后期思想之间的差异与联系则构成了这篇博士论文在写作上的第二个困难。它不仅要求作者对分析哲学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而且也要要求作者在数理逻辑方面具有一定的知识准备,并有足够的耐心和思辨能力去解读维氏格言式的、汗牛充栋的论著和笔记。

此外,我们也不应忽略这篇博士论文在写作中必定会面对的第三个困难,即:既然“现象学”的概念出现在维氏思想最神秘的“转型期”中,既然它的消失和它的出现同样突然,那么,如何对维氏思想发展史上出现的这种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就成为了我们在深化维氏哲学思想研究时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关节点。然而,直到2000年,维氏反省其“现象学”观念的主要思想材料《大打字稿》才作为“维也纳版本”(Wiener Ausgabe)的第十一卷在海外出版,而且除了德文原文以外,目前在国际上还只有意大利文译本可资参考。也就是说,作者只能通过德、意这两种文字来解读《大打字稿》。对于第一外语为英语的徐英瑾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挑战。好在除了具备一定的德语阅读能力以外,徐英瑾在赴意大利学习期间还突击进修了意大利语的基础课程。他不但在意大利文译本的帮助下仔细比照、研读了德文版的《大打字稿》和其他相关的德文著作,而且为了读者的便利,还译出了《大打字稿》的目录结构与部

^①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6页。

分章节,作为其博士论文的第一个附录。凡此种种,无不表明,没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是很难写好这篇博士论文的。

特点之二:敏锐的问题意识。与我十多年来所指导过和接触过的其他博士生比较起来,徐英瑾在治学上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众所周知,在原创性的哲学研究中,问题意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许多哲学家,如文德尔班、克洛纳、波普尔、杜威等,在这方面都留下了重要的论述。作为杜威的学生,胡适也非常重视问题意识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他在日记中谈到王云五勤奋自修、读书甚博,每天光是外文著作就要读100页以上,但在治学上却抓不住中心,陷入了歧路亡羊的窘境。胡适在1921年7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昨天劝他提出一个中心问题来做专门的研究(最好是历史的研究),自然会有一个系统出来。有一个研究问题作中心,则一切学问,一切材料都有所附丽。”^①在胡适看来,如果一个研究者没有问题作为引导,无论是读书还是研究,都会迷失在浩如烟海的资料堆里;同时,没有问题的引导,资料就会变成死的东西,变成一堆无意义的断简残篇。

据我所知,徐英瑾之所以对维氏哲学情有独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一直受到维氏哲学研究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困扰。他的硕士论文探讨的是《逻辑哲学论》中的“颜色不相容问题”。而在解读关于维氏哲学的研究性论著时,他又接触到著名的现象学史家斯皮格尔伯格的论文《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1929~?)》,并敏锐地发现,这是当前维氏哲学,尤其是其转型期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包含着极为丰富

^① 《胡适的日记》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8页。

的含义,它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以下的问题:维氏使用“现象学”概念的具体时段是什么?维氏“现象学”概念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它与欧陆现象学的关系如何?为什么维氏很快就放弃了“现象学”概念?“现象学”概念在维氏哲学发展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维氏“现象学”理论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正是这些问题引导着徐英瑾深入地探索维氏的哲学思想宝库,而他于2002年6月~2003年6月在意大利进修期间,更是废寝忘食地收集、研读海外新出版的关于维氏思想研究的一、二手资料。作为他博士论文的第二个附录的《维特根斯坦对于经验的现象学再现》就是他译出的意大利学者罗撒丽娅·艾姬蒂撰写的重要论文。这篇论文对于我们解读维氏的“现象学”问题有着直接的启发作用。

特点之三:细致入微的分析精神。记得胡适曾把治学的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拿斧头的”,只管粗线条地、大刀阔斧地砍下去,比如,哲学史的写作就是这样;另一类是“拿绣花针的”,需要的是细致入微的分析精神,比如,研究某个哲学家的年谱,就需要对资料进行认真的甄别和细致的分析。目前,在国内学术界,不少人治学是“拿斧头的”,心浮气躁,一路砍下去,对研究对象缺乏细致深入的分析,所以做学问总是深不下去。记得海涅曾经这样评价康德:“康德把思想放在自己面前,解剖它,并且把它分解成为最细致的纤维。所以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可以说是一个精神的解剖学的课堂。他本人在那里始终保持冷静,像一个真正的外科医生那样无动于衷。”^①完全可以说,在哲学研究中,这种细致入微的分析精神蕴含着极为难得的素质和潜能。显然,徐英瑾有志于分析哲

^① 张玉书编选:《海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6页。

学的研究,而分析哲学的治学方法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他的博士论文的各章次序上就可以看出,他对维氏“现象学”之谜的破解,就像剥葱一样,一层层地分析下去,从而引申出令人信服的、富有创新意识的结论:一方面,他指出,维氏在《大打字稿》中使用的“现象学”概念实质上就是维氏在转型期使用的“语法”概念;另一方面,他主张,惟有深入了解维氏在转型期结束时是如何放弃“现象学”概念的,才能获得对他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关于“私人语言”的批判性论述的透彻理解。不用说,在以粗枝大叶为基本特征的研究方法——经验主义和心理主义——泛滥成灾的中国学术界,这种注重分析的治学方式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作为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的第一届毕业生,徐英瑾对外国哲学、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均有一定的涉猎,他的思想也十分活跃。他留系后,主要从事现代外国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我建议他要继续打好外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基础;同时,在现代外国哲学的研究上,也要进一步熟悉大陆人本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由博返约,集中精力治好维氏哲学和当代分析哲学。希望徐英瑾在今后的治学道路上谦虚谨慎,厚积薄发,写出更多更好的学术作品来。

是为序。

俞吾金 于沪上东方文苑

2005年10月12日

本书摘要

尽管对于欧陆现象学运动知之甚少，维特根斯坦还是在他于1929年年初重返剑桥之际独立地提出了一个他自己的“现象学”版本。他的“现象学”观可以被归结为这样一个信条：用一种所谓的“现象学语言”来再现被直接给予的现象乃是可能的，而同样的任务则是日常—物理语言^①所无法胜任的。但通过对于“予料”^②之本性的深入探索，维氏却不得不承认了：再现直接经验的任何尝试都会不可避免地牵涉到物理语言的表达式，且这种牵涉恰恰是以牺牲“现象学语言”自身的独立性为代价的。这一发现最终导致了维氏对于“现象学”的放弃。

本书的讨论将聚焦于维氏哲学转型期中的这一短暂却又意义深远的“现象学阶段”。此项研究所依据的文献除了维氏正面表述

① “物理语言”的德语原文是“physikalische Sprache”。此词本当直译为“物理学语言”，但该词组在汉语中的字面意思乃是指用物理学手段来表达的语言（如关于基本粒子的言谈方式）——可在维氏中期的文献中，“physikalische Sprache”经常是在“gewöhnliche Sprache”（日常语言）的意义上被使用的。考虑到这一点，笔者决定在本书中统一将“physikalische Sprache”翻译为“物理语言”，即指主要关涉到日常物理对象（如桌子、椅子）的语言，以免读者望文生义。

② 在本书中，“予料”一词即“感觉予料”的缩写，与后者对应的外文名称则是“sense-data”，可直译为“在感官中被直接给予的东西”。“data”在拉丁文中的原意即“被给予的”。

其“现象学”立场的短篇论文《略论逻辑形式》以外，还将包括在国际上最新公布的维氏转型期文献汇编《维也纳版本》，尤其是该丛书的第十一卷《大打字稿》。通过对于这些材料的解读，作者将向读者展现维氏在“现象学建构”与“现象学批判”这两个名目下所先后展开的对于感觉予料表达式的研究路数。本书所试图论证的要点可以被概括为：

(1) 维氏的“现象学阶段”可以被视为他关于“心理学的哲学”的长期学术兴趣的发端点——这一兴趣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点，却并未体现于其早年作品《逻辑哲学论》之中。

(2) 通过将“原子命题”解释为对于感觉予料的最简单的描述（而不是像《逻辑哲学论》那样回避对于“原子命题”之所是的正面解说），维氏的“现象学阶段”乃是向我们展现了他该时期的哲学立场与罗素的经验论版本的“逻辑原子主义”之间的令人惊讶的亲缘关系。

(3) 通过否认任何试图用语言手段来标示或描述予料的企图，并通过对于予料自身的绝对性的展示，维氏对于他自己的“现象学”观念的批判实际上乃是复活了他在《逻辑哲学论》时代就已作出的对于“不可说性”与“可说性”的二分法。在《大打字稿》中，这一二分法在他对于时间表达式、空间表达式与人称表达式的分析中得到了细化，并导致了他对于“记忆时间”与“物理时间”的区分，以及对于“视觉空间”与“欧几里得空间”的区分，等等。

(4)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维氏对于“现象学语言”观念的拆解也可以被视为同一观念在被加以彻底化后所导出的必然后果，因为这一拆解工作实际上乃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他在写作《略论逻辑形式》时就已经怀有的信念，即：必须将物理系统严格地区分于

在现象中被直接给予的东西。换言之，维氏在这一拆解工作中所做的，只不过就是暴露了这一信念本身与对于现象之“可说性”的坚执之间的固有矛盾罢了——而所谓“现象学语言”的幻相，亦正是导源于上述坚执。

(5) 然而，根据维氏的本意，感觉予料与物理语言（作为唯一可能的语言）之间巨大的逻辑差异却并不意味着后者与前者毫无关联，而只是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遵循着所谓的“原本—摹本”模式，而遵循的乃是“屏幕呈现—胶片运作”模式。后一种模式同时也就暗示了：现象自身是可以在物理语言/物理系统中被唤起的（或者说，现象是可以包摄于物理系统的）——尽管现象确实不可以被物理语言所描述。

(6) 就这样，维氏便带领我们告别了那种已经过时了的、试图“完美地再现直接予料”的雄心壮志，而由此开辟了这样一片新的思想天地：这里既是所谓的“语法综观”工作的展开之所，同时也是他自己的后期哲学的形成之域。但是，由于还不太情愿立即放弃“现象学”这个术语，维氏毕竟还是在《大打字稿》中暂时地保留了它，尽管此时“现象学”一词的含义已经被等同为“语法”了。而在《哲学研究》的文本中，甚至这种有限度的保留也被放弃了。

(7) 本书认为，只有在透彻解读维氏在《大打字稿》中所作出的“现象学语言”批判的前提下，《哲学研究》对于“私人语言”的批判才能得到富有成果的理解（因为前一种批判其实就已构成了后一种批判的雏形）。根据本书的意见，“私人语言论证”的要点并不在于去否认感觉予料在我们关于感觉的语言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在于对于它们所扮演的角色之本性的重新认识。根据维氏的意见，感觉无论如何也不是对应于语词的被指称物或是名称的

意义之源,而是在特定环境下被呈现出来的、具有绝对自明性的东西——同时它们也构成了使得我们关于感觉的语言游戏得以展开的逻辑前提。从维氏的这一论断中我们不难引申出:像“我”、“现在(当下)”、“这”这样的索引词并非是对于予料自身特征的提示,同时,去谈论现象的时一空形式与人格所有形式亦是误人子弟的。这样,支撑“私人语言”观的两块基石——“必定存在着只可被呈现给‘我’的私人予料”与“必定可能存在着一种被特制出来的用以指称这些予料的词汇表”——就都被一一地摧毁了。

(8) 在要点(7)的基础上,本书作者将向读者展示对于“私人语言论证”的传统解释错失要害之处。众所周知,对于该论证的流行解释策略就是将该论证与维氏对于“遵从规则”之重要性的强调联系起来,因为据说规则是不能被私自地制定与遵守的。但为这些解释者所忽略的问题,却是对于“为何被私自地制定与遵守的规则并非名副其实的规则”这一要点本身的更为深入的说明。为了说明这一“为何”,本书将带领读者回顾《大打字稿》对于“记忆时间”与“物理时间”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将“私人语言”的支持者之罪责指控为对于“规则”一词的误用,以及对于上述区分的混淆。本书认为,只有在理解这一前提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将维氏对于“遵从规则”的强调熔铸到一个完整的“私人语言论证”中去。

(9) 最后,本书将向读者说明为什么后期维氏并不能被解释为一个粗俗的相对主义者,即只愿意承认在一个特定共同体中被遵守的语言规则的相对效用,并主张在关于感觉的语言游戏中去删除感觉所应占据的地位——因为维氏所拒斥的只是感觉印象的可说性,而非这些印象的存在本身。或说得更清楚一点,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标准,相对主义者的如下断言——“当一个颜色样本被给

予一个正常人的时候,他之所见当与他的相应行为毫无瓜葛”——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怀疑论表白,因此该断言是无法在维氏针对怀疑论的攻击中得到幸存的。

关键词与词组:

现象 现象学 现象学语言 感觉予料 记忆时间 语法
私人语言

Abstract

Independent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tinental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Ludwig Wittgenstein developed his own edition of "Phenomenology" as soon as he returned to Cambridge at the beginning of 1929. His conception of "phenomenology" lies in his temporarily held belief in the pos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a so-called "phenomenological language" in favor of representing the immediately given phenomena, which seem to be impossible to be described by the ordinary-physical language^①. Nevertheless, his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data" forced him to acknowledge that any attempt to realize the representation of immediate experience would inevitably involve the expressions of the physical language in itself at the cost of the independence of

① The original German expression of "physical language" is "physikalische Sprache", which should be translated as "physicalistic" according to its face-value. But the term "physicalistic" would naturally remind the readers of the expressions articulated by the vocabulary used by scientists, while "physikalische Sprache" was more frequently employed in the sense of "gewöhnliche Sprache"(ordinary language) by Wittgenstein in his philosophical transition. In consideration for this point, I have made a decision to translate "physikalische Sprache" as "physical language" rather than "physicalistic language" in this book.

the “phenomenological language”. This discovery leads him to abolish the idea of “phenomenology” eventually.

This book would focus on this brief but significant period in Wittgenstein's complicated and gradual transformation from *Tractatus* to his later philosophy. By analyz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unique published text in which Wittgensteinian “phenomenology” was formulated — “Some Remarks on Logical Forms” (abbreviated form: RLF) — and the new-released Wittgenstein's *Nachlass*, especially the *Wiener Ausgabe* including *The Big Typescript* as the 11th volume of it, the author would present a new approach to Wittgenstein'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expressions of sense-data, the implementation of which are both in the name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s “phenomenology”. The author would further argue for the theses listed below:

(1) Wittgenstein's “phenomenological period”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beginning of his lasting interest in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into the end of his life, whereas the interest of this kind didn't appear obviously in *Tractatus*.

(2) By interpreting the “atomic propositions” as the simplest description of the data instead of avoiding illustrating what it is as *Tractatus* did, Wittgenstein's “phenomenological period” does show us an amazing affinity between his own standpoint at that time and that of the Russellian logical atomism, which is sure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mpiricist tradition.

(3) Wittgenstein's critique of his phenomenology, however,

revives the celebrated Tractarian dichotomy between “unspeakability” and “speakability” in a new context by denying any attempt to employ any linguistic tool to designate or describe the absoluteness of the data which could be only “shown”. In *The Big Typescript*, this dichotomy is detailed in his analysis of the temporal, spatial and genitive expressions, resulting i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unspeakable “memory-time” (*Gedächtniszeit*) and the speakable “physical time”, and that between the unspeakable “visual space” (*Gesichtsraum*) and the speakable “Euclidean space”, etc.

(4)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onception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language” could also be seen as the logical consequence of the radicalization of the one and the same conception, since this destruction does reinforce rather than weaken RLF’s original intention of distinguishing the physical system from what are given in phenomena by demonstrating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his intention itself and the insistence on the speakability of the phenomena, which gives birth to the illusion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language”.

(5) Nevertheless, what the rad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nse-data and the physical language (as the unique possible language) implies, according to Wittgenstein, is not that the latter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ormer, but tha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two does not follow the “original sample-copy” pattern but the “screen-presenting — film-operation” pattern,

which indicates that phenomenon itself can be aroused by or included in — rather than to be described by — the physical language/system.

(6) Thus Wittgenstein leads us to depart from the obsolete ambition of representing the immediately given data perfectly for a new destination where a comprehensive “perspicuity” (*Übersicht*) of the “grammar” should be required and where his later philosophy is coming into being. However, with the reluctance to give up the term “phenomenology” rapidly, he still kept on using it temporarily in *The Big Typescript* by identifying it with “grammar”, although this terminology didn’t survive in the text of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7)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e so-called “private language argument” which appears in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can only be fruitfully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Wittgenstein’s critique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language” which appears in *The Big Typescript* and essentially constitutes the prototype of the former. The point of this argument, as the author believes, doesn’t consist in the denying of the roles that sense-data do play in our language-games but in the recognition of what kind of roles that they really play. They are not, at any rate, the referents of the corresponding word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nse of names, but are shown with absolute evidence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constituting the pre-conditions of certain language-games on impressions. What can be inferred immediately from this